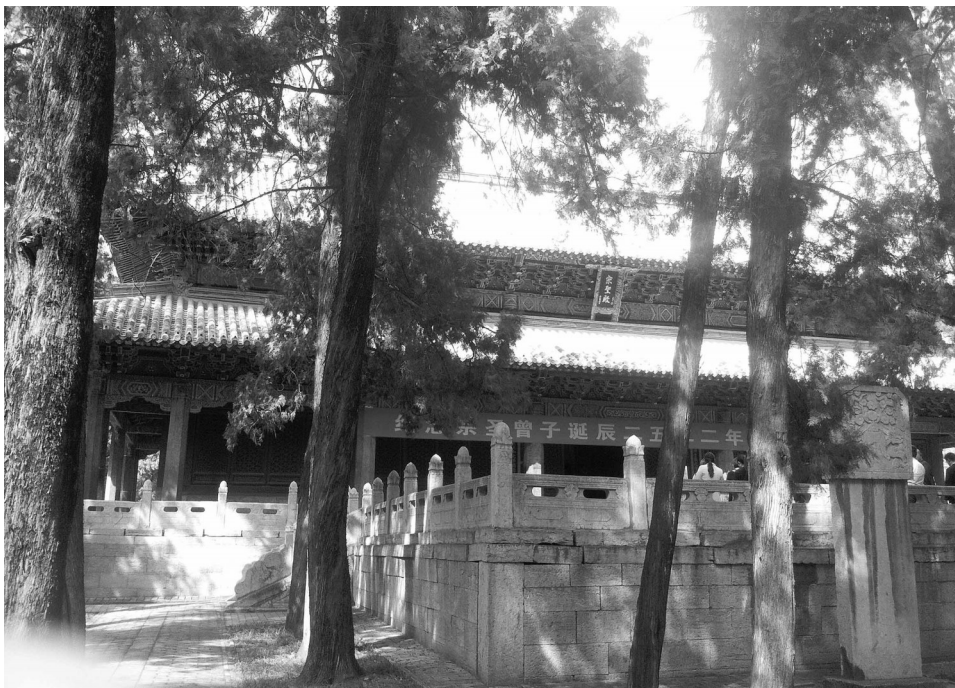


发现

《曾子费人考实》与曾子故里“嘉祥说”“平邑说”

时鑑



宗圣曾子，名参，字子舆，作为春秋战国之交著名思想家，在儒学创始、发展和传承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。曾子故里，汉代司马迁《史记》记为“曾参，南武城人”。这个“南武城”，在今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四十华里南武山下，这既有史书记载可证，也曾有曾氏宗谱可证，还有武城遗址可证。

明代费地学者、《沂州志》主编王雅量作《曾子费人考实》，认为曾子故里在费县武城（今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境内），由此引发嘉祥说学者与平邑说学者几百年的学术争论。

王雅量《曾子费人考实》一文，其中最为关键、最为核心的，是引用东汉学者王符《潜夫论》浮侈篇里的一段文字，作为曾参故里在费地之武城的得力证据。王雅量引述道：“后汉王符《论侈弊》曰：‘毕郢之陵，周公非不忠；南城之墓，曾子非不孝。’”而对照王符《潜夫论》，王雅量这段引文有四处错误：其一，王符《潜夫论》浮侈篇，王雅量引文为“论侈弊”。按王符“浮侈篇”为讥讽整个社会奢侈现象，抨击丧葬奢侈只是其中一部分，王雅量有何理由改“浮侈篇”为“论侈弊”？其二，王符原文为“郇毕之郊，文武之陵；南城之垒，曾析之家。周公非不忠也，曾子非不孝也”。王雅量未尊重原文，删改为“毕郢之陵，周公非不忠；南城之墓，曾子非不孝”。这里既然前面明确有“后汉王符《论侈弊》曰”，王雅量却省略原文，并把前后文字顺序作了颠倒；其三，王符原文“郇毕之陵”，王雅量引文错写成“毕郢之陵”，这是作为古代学者的一个常识性错误。严格说，郇毕二字不可颠倒，郇是郇京，是西周京都；毕是毕原，也称毕郢原，是郇京之郊野。譬如周康王姬钊为周成王姬诵之子，在位 26 年，病死于郇京，葬于毕原。郇京和毕原两者并提，可称“郇京毕原”，却不能说“毕原郇京”。其四，王符原文“南城之垒，曾析之家”，王雅量却抄引简写为“南城之墓”，特别是“家”改写为“墓”，更是没有任何道理。王雅量的 26 字引文 4 处常识性错误，未免让人遗憾。

王雅量文章接着引述唐章怀太子李贤注，“南城在今沂州费县西南”，然后评点说：“今曾点墓不可考矣，而唐章怀太子去春秋未远，当时古迹必有存者，其所注书，大率门客所考，必有亲见其迹而非漫称者”。分析这段文字，第一，王雅量承认“今曾点墓不可考”，但又说“章怀太子去春秋未远”，其门客“必有亲见其迹而非漫称者”。再看王雅量所引章怀太子李贤注释文字，并没有“当时古迹必有存者”的意思。如此推论，王雅量所说章怀太子门客“亲见其迹”是不存在的。第二，王雅量断言“章怀太子去春秋未远”，这个“未远”是多远？曾参之父曾皙死于鲁哀公二十年，即公元前 475 年；李贤召集门客注释《后汉书》是他为太子期间，而被立太子时间为唐高宗上元二年（675 年），调露二年（680 年）因谋逆罪被废为庶人，流放巴州。最早按 675 年计算，李贤距曾皙去世已经 1150 年；一千多年在王雅量看来是“未远”，显然失当。现在看王雅量与李贤相隔多远？王雅量生卒年为 1566—1633 年，按王雅量去世时间 1633 年，李贤被立太子 675 年计算，王雅量距李贤为 958 年。一个相距 1150 年，王雅量称“未远”，门客“必有亲见其迹”者；一个相距 985 年，王雅量却称“曾点墓不可考”。按王雅量逻辑推论应当是，曾点墓在李贤时因“去春秋未远”有门客“亲见其迹”，而王雅量去章怀太子李贤“未远”，则曾点墓“古迹必有存者”，又怎么会“不可考”呢？第三，其实王符“浮侈篇”这段文字的意旨，是说周文王、周武王没有立墓，后世注者引司马迁文字“在郇东南杜中，无坟陇”，再引东汉学者崔实（又名崔寔）《政论》文字“文、武之兆，与平地齐”。既然前文称郇毕之郊没有文武之陵，那么后面南城也就相应没有曾点之家。曾子为什么不给父亲立坟墓？西汉桓宽《盐铁论》散不足篇做了解释：古者“庶人之坟半仞，其高可隐”。且王符浮侈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：“古者墓而不崇。仲尼丧母，冢高四尺，遇雨而堕，弟子请治之。夫子泣曰：‘礼不修墓。’”王符“南城之垒，曾点之家”，实际上就是称赞曾子尊礼而不给父亲修墓。曾点之墓于曾子在世之日既已无存，何来唐代李贤门客“亲见其迹”？

实际上，我们根据章怀太子李贤作注分析，王雅量所引文字应出自《后汉书》王符传。按《后汉书》王符《潜夫论》浮侈篇，本段文字为“郇毕之陵，南城之冢。周公非不忠，曾子非不孝”。这表明，把王符这段文字缩简不是王雅量首创，而是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晔之

所为。不过王雅量在引用时，还是改了原文、颠倒了顺序，并且两处文字就有明显的常识性错误。

为了更全面地了解《后汉书》王符传和章怀太子李贤注，不妨把王符传《潜夫论》浮侈篇相关文字全文抄录于此，并以注释文字对照：“案郇毕之陵，南城之冢。毕，周文王、武王葬地也。司马迁云‘在东南杜中，无坟陇’，在今咸阳县西北。孔安国注《尚书》云在长安西北。南城山，曾子父所葬，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。周公非不忠，曾子非不孝”。分析这段文字，可以看出两点，第一，周文王、周武王葬于毕原，但没有坟陇，至今墓在何处，学者们仍争讼不已。第二，南城，章怀太子李贤注释为“南城山”。王雅量在点评时去掉“山”字而曲解为“南城”。一个是山名，一个是城名，两者应该很明显不是一回事。



在此退一步说，王符《潜夫论》所称南城即使不是南城山，也应该是对司马迁《史记》所记“南武城”的简缩。这里有两点理由，第一，郇毕，为两个地方，一个是郇京，一个是毕原，王符却简缩为“郇毕”；那么后面南城，为什么不是“南武城”的简缩？第二，从词句修辞上可以看出，王符这段文字用的是对仗，前面是四个字，后面也只能是四个字，这样，南武城就必须简缩为两个字，简缩哪一个字呢？其一，去掉“南”字为武城，如果王符确实认为费县武城为曾皙墓所在，这就不用简写，直接用“武城”就可以了。其二，去掉“城”字为南武，这有点不伦不类；其三，去掉“武”字为南城，这才应该是最好的选择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曾点墓无论是在嘉祥武城还是在平邑武城，至少在王雅量写作《沂州志》时已经“不可考矣”。现今平邑县郑城镇境内曾点墓，为清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 年）所立，这显然是受王雅量“曾子费人考实”影响，“欲援古哲芳躅，以为梓里光辉”罢了。平邑说学者以清代所修曾点墓，证明曾参为平邑武城人，就更没有学术争论的价值了。再就是曾参墓，《曾氏族谱》早有记载在嘉祥武城南武山，明成化初年“山东守臣上言，嘉祥南武山南，玄武山之东，有渔者陷入一穴中，得悬棺，其前有碣，镌曾参之墓，奏诏封树丘陵，建飨堂、神道。路旁松柏树木缭以土垣”。嘉祥重修曾子墓始于此时。

关于曾参墓在明代成化初年被发现一事，平邑说学者全部持否认态度，认为“称嘉祥‘得悬棺，其前有石碣，镌曾参之墓’，实为子虚乌有”。平邑说学者以明平邑曾点墓、曾参墓于清代乾隆年间修建事实，竟然指责明代正统年间修复为祭祀宗圣曾子的嘉祥曾子庙，声言“它们距曾子去世已一千八九百年，以此作为曾子故里为嘉祥庙的证据，是经不起推敲的”。而实际上嘉祥曾子庙始建年代要早于明正统年间，现嘉祥南武山曾子庙内保存有明正统甲子年（1444 年）重修石碑，上面有嘉祥县教谕温良奏请重修宗圣公庙的记述，奏文以郇国宗圣公“兹庙倾圯”为由“奏请修葺”。这一事实说明平邑说学者根本不顾曾子庙在明正统年间已“历岁滋久，风雨震陵”之历史真实，其所辩论曾子故里在平邑武城之论点论据，才的确应该是“经不起推敲的”。

现在我们回到王雅量《曾子费人考实》文章上来。王雅量在提出四条论据证明“费县关阳之武城”的系（澹台）灭明所居之武城”之后，又用四条论据证明费县关阳之武城”即曾子所居之武城”。其中第二条论据“毕郢之陵”“南城之墓”，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辨明，现

在看王雅量第一条论据：“曾子，郇之后也。莒人灭郇，后人遂去其‘郇’字之傍以氏焉。今郇城既在沂州境，去关阳不过八十里，曾氏自郇城而使居之，亦甚便也。”王雅量这一论据其实是自话自说，或者说是王雅量主观推测臆断文字。当时史实是郇世子巫为避难离开郇国，求助于鲁国、晋国皆不可复国，见事不可为，才去掉“郇”之偏旁，以曾为氏。就在郇国亡国第三年，莒人还敢于“伐我东郇，以疆郇田”。这就说明，郇世子巫只有远离郇国，才可保证自身安全，怎么敢居住在去郇城“不过八十里”的关阳呢？事实上，郇世子巫在鲁国最早是居住于表哥穆叔（叔孙豹）封地，穆叔封地在郇，郇国都城西周早期在今宁阳境内，春秋后期在今汶上境内，今汶上县郭楼镇有古郇村，即古郇国之重要遗址。这一事实也说明，为什么历代朝廷封曾子为郇伯、郇国公和郇国宗圣公的根本原因。顺便说一句，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远世一世祖荣旂（字子祺），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，其家就居于郇邑。《史记》、《孔子家语》均不记述其里籍。现今所见荣旂介绍文字，为“春秋鲁国人（一说卫国人）”，笔者作为“荣氏家族根在济宁”课题主持人，对其生平进行详细考证，结论是荣旂与卫国没有任何关系。

现在看王雅量第三条、第四条论据，这两条论据主要是论证曾参与费的关系。王雅量在第四条论据文字之末，声言“夫武城可以混窃，而古今以费名者无二地，费不可混也”，这就实际上承认了鲁国有两个武城，而王雅量前面的论述因此失去了立论依据。按照王雅量的这段文字推论，应该是鲁国可以有二个武城，但费地却只有一个。而平邑说学者一个主要论点就是“武城与两费均为春秋鲁国城邑”，“春秋鲁国只一武城（城），即春秋武城、战国南城、西汉以后的南武城，皆指费县之武城（今平邑县南武城）”；“鲁有两费，一在今山东费县，一在今山东鱼台”（《宗圣曾子》李洪廷《谈武城与两费》），这就是说鲁国武城只有一个、费却有两个，这个论断本身就是对王雅量“武城可以混窃”、而费“无二地”的否定。

那么，王雅量是怎么论证“费名者无二地”的呢？现在看王雅量第三条论据：“又按《史记》‘秦武王三年，欲以甘茂伐宜阳，甘茂托词以对曰：‘昔者曾参处费，费有杀人者者与曾参同名，有人三告其母曾参杀人，其母投杼（zhù，音柱，织布机梭）而走’”。如曰曾子居武城为宾师之地耳，非其家也，胡以其母皆在而且织也？”王雅量这个论据是想证明曾参与费地的关系，因曾母“皆在而且织”，所以曾参应以费为其家。这里《史记》原文为“昔曾参处费”，王雅量引文为“昔者曾参处费”，这里我们且不说王雅量学术态度不严谨，就看其引文为“曾参处费”，何以在分析文字成为“曾子居武城”？这里无需探究“曾子处费”是在鲁东之费还是在鲁西之费，即使是鲁东之费，又与武城有何关系？费地是季孙氏私邑，武城为鲁国一邑，孔子弟子子游为武城宰就表明了武城和费邑并不是归属关系，而是平等或并列关系，以“曾子居武城”代替“曾参处费”，王雅量颠倒黑白、指鹿为马、偷换概念之手法，也足够方家引以为耻、千夫所指了。

我们继续看王雅量论证“曾子费人”的最后一个论据：“《曾子杂篇》载：‘鲁人攻费，人责其罪。曾子谓费君曰：‘请出避，姑无使狗家人吾宅也。’费君曰：‘寡人之为先生厚矣，今寡人见攻，而先生去之，安能为先生守宅也？’曾子不答而出。及鲁攻费，责费之罪者十，而曾子所陈者九。费人后修曾子之舍而复迎之。’夫所居不曰‘馆’而曰‘宅’，则武城果寄迹之地耶？既称‘居武城’，又曰‘居费’，则《史》迁所谓武城人者其为费之武城无疑矣。”



王雅量这一论据所引文字别见于西汉刘向《说苑》尊贤篇：“鲁人攻郇，曾子辞于郇君曰：‘请出，寇罢而后复来，请姑毋使狗家人吾舍。’郇君曰：‘寡人之于先生也，人无不闻；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，我胡守先生之舍？’鲁人果攻郇而数之罪十，而曾子之所争者九。鲁师罢，郇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。”分析这段文字，我们所要关注的最主要的有三处：第一，鲁人攻郇；第二，曾子辞于郇君；第三，鲁人攻郇而数之罪十，而曾子之所争者九，鲁师罢。从这三点可以看出，第一，文中称“郇君”，意味着郇是一个国家；第二，鲁人攻郇，说明这是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；第三，鲁国攻打郇国列举十条罪名，曾子据理驳斥九条，鲁国军队因此罢兵回师。那么问题来了：第一，按照王雅量“以费名者无二地”论断，这个郇，应当是季孙氏封邑费地。季孙氏作为三桓之首，长期在鲁国专政，费邑自有家臣管理，何时曾为方国？第二，如果季孙氏效法公山不狃，据费邑而叛鲁，信奉老师孔子“危邦不入”理念的曾子，不但不早早离开费地，反而要在鲁国攻打费地时站在季孙氏这一边，这岂能是弘毅君子之所为？第三，如果季孙氏据费地自立，鲁国讨伐，不要说“数之罪十”，就是鲁师指责季孙氏据费地与鲁国为敌这一条罪状也理直气壮、名正言顺；曾子何以“所争者九”，自愿为一个叛乱臣子辩护？第

四，所谓“鲁人攻郇而数之罪十”，史书中对这十条罪没有详细记载，但从曾子“所争者九”，且能让鲁师理屈退师而分析，鲁人攻郇理由，其实不过就是“季氏将攻颛臾”的翻版而已。第五，鲁人攻郇，当时鲁国究竟谁能调动军队？——鲁哀公？史书称“三桓攻公，公奔于卫”。鲁哀公自顾不暇，何能调动鲁师攻季孙氏之郇（费）？——鲁悼公？史书称“悼公之时，三桓胜，鲁如小侯，卑于三桓之家”。鲁国政在三桓，鲁哀公、鲁悼公何能调动鲁师攻讨所谓季孙氏之郇（费）？

其实，我们已经不需要列举上述五条反驳王雅量之第四条论据。这是因为，即使平邑说学者也已经承认，当时鲁国除了东边有季孙氏之费邑外，西边还有一个古老的费国。譬如平邑说学者李洪廷《谈武城与两费》一文，就对“两费”作了考辨：“鲁有两费，一在今山东费县，一在今山东鱼台”。由“鲁人攻郇”这段文字分析可知，这个“郇”其实就是位于今山东鱼台之费国。



王雅量列举上面四条论据后，又设问自答，写出三段文字，第一，“或曰‘曾氏之庙立于嘉祥，岂无据耶？’嘉祥古为大泽，《禹贡》曰‘大野既潴’，既此大泽也。汉武帝时，河决，泄其潴水，历汉魏以来皆未成邑。”王雅量这段解释真是强词夺理，所提论据和所争论点没有任何关系。且不说鲁国西部今嘉祥、金乡、鱼台、单县等地自夏商周以降一直有百姓居住这一事实，就是王雅量用记述大禹治水之《禹贡》“大野既潴”来推论“嘉祥古为大泽”，这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后面“汉魏以来皆未成邑”，又和春秋鲁国西部有没有武城等城邑有什么关系？第二，“考之《春秋》，只闻鲁人‘西狩于大野，获麟焉’，未闻至南武城也。”王雅量这段文字，本身就是对“嘉祥古为大泽”的自我否定。试问，如果嘉祥当时为水泽，鲁人何以能在此狩猎？何以能在此“获麟”？再就是“未闻至南武城”，武城只是鲁西边境城邑之一，史书所记不仅“未闻至南武城”，也“未闻至郇城”，更“未闻至单父”，我们能说当时鲁国西部大野没有这些城邑吗？第三，“尤可据者，‘武城，鲁下邑’今嘉祥虽属之鲁郡，然兖州以西在春秋为任地，非鲁下邑也。或曰：‘鲁方百里者五，嘉祥非初封之鲁，或战国之鲁，是亦鲁下邑。’曰：‘不然，孟子居邹，季任为任处守，即战国之时，任自任也，岂得称鲁下邑耶？’”王雅量这段文字关键一点，是称“兖州以西在春秋为任地”。当时鲁国西部有任国不错，但任国范围仅相当于今天济宁任城、微山一部分，把鲁国西边武城、单父、郇城、亢父、费国等城邑和方国皆列为“任地”，这个“任国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所记述齐人“伐我西郇”，岂不都成“齐人伐任西郇”了？王雅量官至光禄寺正卿，官固然做得很大，可惜历史知识、地理知识却欠缺了一些。

王雅量这篇文章最后文字，批评一些“好事者”，“偶得于地里之讹传，姓氏之仿佛，辄欲援古哲芳躅，以为梓里光辉”。辨析其文章《曾子费人考实》，不禁让人哑笑不止：因为当时嘉祥并没有“好事者”强争曾子故里在嘉祥，因为这是无可辩争之事实；倒是王雅量本人，因“好事”而撰写《曾子费人考实》文章，从而引发几百年学术之争端。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岂非王雅量先自之谓乎？

太史公司马迁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曾参，南武城人。”此南武城即曾子故里，此南武城在今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四十里南武山下，愿曾子故里之争，至此平复矣！

让圣贤曾子在天之灵安息，这应该是天下曾氏宗亲共同心愿，也是所有关心曾氏宗亲团结和睦、曾氏家族繁荣兴旺的学者们的共同心愿！

■成岳 摄影



故里钩沉

秧板田

田守勇

春末夏初，正是割麦种稻的季节。因为靠近运河的缘故，而且又在河堤上挖渠引水并修建了一座排灌站，所以我们村子的田地大多数是水田，夏秋时节以种植水稻为主。

每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子，都有一块专门用以秧稻苗的田地，我们那里叫作“秧板田”，一般地块儿不大，而且地势相对低洼，方便灌水，一条或数条水渠通向干渠、河流或者其他水源。我们村子的秧板田集中在村西公路西侧偏北，与邻村西正桥的地搭界，是距离村子比较远的一块地。

秧板田最忙的时候，是春末秧上稻苗，至初夏拔秧栽稻之时。秧苗之前，村里的排灌站把运河里的水抽上来融进了冰雪的河水，在闲了整个冬季的沟渠里欢快地流淌，汩汩滔滔流进秧板田里。各家各户都有人扛把铁锨，到秧板田里灌水，在自家田埂上挖开进水口，就蹲在地头看水流打着滚儿、翻着花儿流进地里。

开始秧苗前的大约一两周时间，用砂缸、木桶之类的家什稀释了石灰水，把精选的稻种泡进来，再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封住口，麻绳一圈圈地缠住，唯恐渗进空气。过了几天，稻粒的一端就会顶出嫩黄发绿的牙尖儿。这几天农家人也闲不住，把堆在村里村外的粪堆扒开、晒干、敲碎，支起筛子一遍遍地筛，拣去石子砂砾。沤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粪肥筛成粉面状，装进袋子里，码在自家过道下面避雨的地方，然后到秧板田里整板儿。所谓整板儿，就是在地里整出一条条大约一米多宽的平面，我们叫做“稻板儿”，长度以自家田地的长度为准，板与板之间是窄窄的水沟，以利于田间劳作，例如施肥和拔草。

每年都是在五一这天，几乎全村行动，汇集在秧板田这块方寸之地，开始秧稻苗。去秧苗的时候，把筛好装袋的粪肥和发了芽捞进竹筐的稻种一并带到地里。秧板田里人头攒动，田间小路上横七竖八的自行车、地排车、粪肥袋子、农具和水盆。每年五一放假回家，正好能赶上秧稻苗。

先把整好的稻板儿再加工一下，敲碎土坷垃，用铁齿耙或者木锨把稻板儿推平抹平，两个人站在稻板儿两边的水沟里，俯身按住一块木板在稻板儿表面来来回回地推拉，直到泥浆覆盖整个稻板，片片崭新的平。然后把稻种撒到板面儿上，要均匀，不能片片搭搭，自家地里撒多少稻种，农家心里最有数，过多过少都不行。撒好稻种，用木锨把板面抚平，把稻种按进泥中，又不能太深了，接着再挎着篮子或抱着袋子，装上粪肥，用手撒在板面儿上，薄薄地摊上一层，既是施肥，又可以避免鸟雀把稻种当食物啄了去，所以粪层摊得要厚薄合适。最后就是灌水，因为整地撒种的时候，地里的水多少要适中，要刚刚漫过平整好的稻板儿，过大不利于整板，在板际之间的水沟行走时，激起的水花会把撒好的稻种冲刷掉；太小了整板时泥块会粘在农具上，也拔不动腿，费劲儿。如果水多，还要排水，甚至拿了水盆，一盆盆向外刮水。给地灌水并不是简单挖开一个口子，让水肆无忌惮地流到地里去，而要讲究水量的适宜。等一切做完了，再放水进来，让水刚好漫过秧板儿。

秧好了稻苗，人们几乎每天都要到地里看一眼，关键是看看苗如期出来没有、出齐了没有，看着稻苗齐刷刷地钻出水面，叶片由黄而绿，一片两片渐渐增多，逐日长高，迎风摇曳，压在心底的石头才算彻底落下来。

这只是我把以前劳动经历的场景剪裁下来，其实从种水稻到吃上大米，秧苗并不是一道最初的工序而已，但就是这样一个农活儿，需要种田人的耐心和细致，像对待婴儿的精心呵护，又敬畏而虔诚地不违农时。仔细想一想，哪一项农活不凝聚着农家人的细心？

地名杂坛

樊山

张春彦

即使在邹城，樊山也不能算作很大的山头。山坡的北面，百许户人家傍山而居，村庄也就叫做樊山村了。在这个村庄里游走，鸡鸣犬吠，莺歌燕舞，隐约里能看到黄发垂髫悠然自得，总是有穿越的感觉。

山脚下的村口，有个转动了几百年的石磨，如今仍然用着。有风吹过的时候，石磨会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，让人顿生疑惑，那是它自己在转动吗？风吹动的，不仅是这石磨，还有旁边那棵百年的柳树。柳树的旁边，是湮没光阴里许久的土地庙遗址。高耸的地基，零星散落的残垣断壁，精美的石制“乩”字匾，彰显着当年的显赫。我寻歇息的长者，白须冉冉，满脸沧桑。问他当年庙宇的景象、供奉着哪路神仙时，他们幽幽地叹口气，轻声絮叨：可大了是附近最大的土地庙。庙里住着好多神仙，听我爷爷的爷爷说，那里有：山神奶奶、牛马王、土地老爷靠山墙。说完后，把眼睛一闭，就沉浸在遥远的回忆里。

土地庙往上，有一处清乾隆年间修的老房子，还住着人家，主人还保留着光绪年间买卖房屋的地契。房屋的梁是楠木做的，青石铺地砌墙。花砖拼接的房檐，刻有荷花与八仙的形象。在石头的古朴厚重里，不经意间流露出栩栩如生的活泼。院子的门口，主人植了一棵紫藤，花开时，难言的妩媚。

再往上走，就在石头垒砌的房子和院子间穿梭了。院子密密麻麻，错落有致，成了深深浅浅的巷子，前后望去，曲径通幽，没有尽头，满眼形形色色的石头。院墙完好如初，墙缝的野草，鸡鸣犬吠，莺歌燕舞。房顶虽然近乎全部坍塌，但墙基却完好。修筑墙基的石头上，镌刻了简单古朴的花纹，横着的叫“黄瓜架”，竖着的叫“一柱香”，斜着的叫“风摆柳”，相间的叫“满天星”，让你在凝视时，会心生淡淡的哀愁。院子里各种生机勃勃的树，有的怒放着美丽的花，给这淡淡的颓唐，浓墨重彩地涂抹了鲜活。

看到村东南角、山坡中间那眼百年前的老井，你才会明白山名的由来。最初的时候，村民们也是在山阳而居，因为缺水，不得不翻过山来，到山的背面生活。为了纪念那段困苦但并不缺少希望的山阳生活，村庄得名“翻山”。后得益于全村之户凿出的老井，村民们得以代代相传、繁衍不息，村里的诗书人家、饱学之士，感恩于这座山是村庄的屏障和篱笆，遂里名为樊山。于是那袅袅的炊烟和淡淡的乡愁，就悠悠地飘荡了这么多年，凝聚在如今然清澈的乡井。怀旧的人们，还是习惯来这里打水喝，说水里有原来的甘冽，自然的味道。井水流过的石沟旁，生长了几株北方少见的茶树，掐一把叶子，放在手心，能闻到几许清香；放进嘴里，咀嚼几口，如老井里的水一样的芬芳。

到山顶，能看见乱世时村民为自保而修建的石头山寨。房屋早已坍塌，但六米多高、三米多宽、两千多米长的围墙，依然矗立着，用沉默展演着当年的宏浩，冥想岁月的轮回，叹息历史留下的深深浅浅的遗憾。爬上墙头，四下俯瞰，茂密的树郁郁葱葱，漫山的野花千姿百态，清脆的鸟鸣，翩翩的蝴蝶，争先恐后，似乎真的到了桃花源里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游走在这样的村庄，看疏篱曲径，观竹石烟霞，听嫩柳响碧纱，让人期盼可以采摘到自己喜欢的花儿。